

# 女性家政就业中的社区嵌入与协作实践：基于家政企业的案例研究

左丹 商梦同 刘清革

贵阳人文科技学院，贵州贵阳，550025；

**摘要：**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阶段，农村女性的家政就业逐渐成为地方治理与基层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。本文以“潜力女”企业为研究对象，基于 5 位家政从业女性的深度访谈与民族志资料，探讨女性如何在地方化平台中实现就业嵌入、社会协作与身份重塑。研究发现，“潜力女”作为企业、社区、政府协同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，不仅为女性提供了稳定收入与职业路径，也通过工会、妇联、技能培训等机制，构建出一个具备社区嵌入性与多元协作性的支持体系。女性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由“脱贫对象”向“行动主体”的转变，其就业不仅是经济活动，更是一种文化与社会再组织的过程。本文尝试以参与式发展为理论工具，为理解农村女性在地方性制度安排中的实践能动性提供新视角，并对后脱贫时期的乡村治理与妇女发展提出政策启示。

**关键词：**家政就业；社区嵌入；协作实践；女性脱贫；地方治理

**DOI：**10.69979/3029-2700.25.10.046

## 引言

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逐步衔接的背景下，大量“脱贫人口”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向服务型就业市场，家政行业成为接纳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重要渠道之一。尤其在中西部地区，随着地方政府、妇联组织与社会企业协同推动家政培训与妇女就业支持项目，家政行业正在演化为一种兼具市场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基层发展机制<sup>[1]</sup>。

在现有文献中，关于农村女性脱贫路径的研究多集中于产业扶贫、非遗传承、技能培训等议题，而对于“家政就业”这一具有明确劳动价值与社会性别特征的领域，系统研究仍显不足。一方面，家政劳动长期处于“非正式经济”与“性别劳动”交叉结构之中，其制度认同、劳动保障与社会地位问题受到广泛争议<sup>[2-5]</sup>。另一方面，家政行业中的女性往往通过社区组织、工会机制或企业平台参与劳动协作、职业培训与情感支持，展现出丰富的社会实践路径<sup>[6,6-8]</sup>。

本研究以“潜力女”企业为案例，探讨女性家政从业者在地方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嵌入路径与协作机制。

本研究的问题在于：

(1) 家政就业平台如何通过社区机制实现对农村女性的社会嵌入？

(2) 在“潜力女”的组织架构中，如何形成多层次协作机制以支持女性的职业发展？

(3) 女性如何在“被雇佣”与“参与治理”之间实现身份与能动性的转化？

为回应以上问题，本文结合民族志方法与访谈材料，深入分析女性家政劳动的制度环境、组织机制与实践逻

辑。

## 1 理论框架

### 参与式发展理论

最早在中国引入“参与式发展理论”的学者之一是李小云教授，他的观点是，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，通过自身的能力正面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进行<sup>[9]</sup>。强调发展的焦点应该是人的发展，只有人们真正发展，这种发展才是可持续的<sup>[10]</sup>。参与式发展对多元化、非线性的道路具有积极的作用<sup>[11]</sup>。参与式发展的内容和要义应该要改变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，在角色转化时应该要有同理心，懂得换位思考<sup>[10]</sup>。

本研究中，参与式发展理论为探讨家政就业平台与农村女性社会嵌入、组织架构中的协作机制以及女性身份与能动性转化提供了理论框架。

## 2 研究设计与方法

### 2.1 研究对象与案例选择

本研究聚焦家政企业“潜力女”内部组织架构下的女性劳动者群体。该企业成立于 2017 年，是当地妇联和人社部门重点扶持的代表项目之一，现有员工超千人，涵盖育婴、月嫂、保洁、护工等多个服务类型。公司内设妇联、工会及职业培训中心，并承担政府技能培训任务，组织结构与社区嵌入特征明显。

本研究共访谈了 5 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员工，涵盖管理层、月嫂、保洁员、陪护员等多个岗位层级，包括布依族、侗族、苗族与汉族女性，年龄分布为 25 岁至 5

2岁之间，均有脱贫经历，部分为异地搬迁户。

## 2.2 数据收集方法

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方式开展数据收集，时间跨度为2024年6月至2025年3月。

**深度访谈：**采取半结构式提纲进行一对一访谈，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：1) 家政行业的进入路径与动因；2) 社区与组织的支持机制；3) 协作过程中的困难与成长；4) 家政工作的个人与家庭影响。

**参与观察：**研究者多次进入“潜力女”家政总部办公区与培训中心，观察日常事务运作、培训组织、员工例会等场景。

**文件资料分析：**研究还收集了该企业与地方妇联、人社局的合作文件、培训计划、制度章程等内部材料，辅助理解政策嵌入与制度运作。

## 2.3 数据分析策略

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文本与观察笔记进行编码与分析，参考 Braun & Clarke (2006) 提出的六阶段流程：熟悉数据；初步编码；归纳潜在主题；审核主题；命名与界定主题；撰写报告<sup>[12]</sup>。编码过程中结合前期构建的分析框架，设定初始编码类目（如：协作机制、社区资源、技能培训等），在实际分析中持续调整与生成子主题。此外，研究采用 NVIVO 辅助进行编码管理，确保分析过程系统、可追溯。

## 2.4 伦理考量与研究局限

本研究遵循科学研究伦理规范，所有受访者均签署口头或书面知情同意声明，数据处理过程中实施去标识化与匿名化原则。研究重在呈现女性多元主体性与组织经验，避免身份标签化及“弱势”叙事。

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样本集中于“潜力女”单一企业，尽管其具有代表性，但仍需谨慎推广至所有地区与组织类型；其次，研究者身份可能对受访者陈述产生一定“期望回应”效应，已通过反复访谈与多源验证尽量控制偏差。

## 3 经验呈现与分析

本章以参与式发展理论为分析视角，结合访谈与观察数据，从“社区嵌入”“协作机制”与“能动性”三个维度，对“潜力女”中的女性劳动实践进行剖析。

### 3.1 社区嵌入：组织资源与地方社会的双重支撑

“潜力女家政”的运作模式高度依赖于社区资源与地方支持体系，其总部与培训中心设立在城区，并与多个异地搬迁社区保持合作关系。多数女性员工本身就是社区居民，呈现出“家岗一体化”特征。

异地搬迁户腊梅花提到：“公司离家就十几分钟，

上班方便，照顾老人孩子也不耽误。”这种“近场就业”模式不仅降低了女性外出务工的成本，也重塑了家庭分工结构，增强了女性在家庭决策中的参与度。

同时，公司设有妇联与工会系统，为员工提供托育、助学、健康体检等综合服务。如管理人员“茉莉花”所言：“每年孩子考上大学，公司还有生活补贴，这让我们感受到组织就是娘家人。”这类资源整合机制体现了“社区嵌入”制度基础，有效提升了妇女的安全感与归属感。

### 3.2 协作机制：集体互助与组织信任的形成路径

“潜力女家政”以团队协作为基础运行，强调“师傅带教”“互助小组”“项目对接”制度安排，使女性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形成“成长—支持—回馈”的良性循环。新入职的“杜鹃花”在提到自己从保洁员到项目经理的成长经历时表示：“一开始啥都不会，是师傅一点点教，边干边学，后头做顺了，公司就信任我让我带项目。”

此外，公司在冲突协调上提供支持，缓解女性单独面对雇主的压力，使她们在服务性劳动中保持专业性与尊严。如“腊梅花”所述：“我遇到的客户都挺好，公司也会帮我们处理一些棘手问题。”

### 3.3 能动性：从家庭角色到职业主体的转化

尽管家政行业仍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工与文化污名，但在“潜力女家政”平台，女性主体性在实际劳动中得以强化与重构。多数受访者表示，通过接受培训、取得职业认证并获得稳定收入，逐渐改变了家庭中原有的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格局。

“沙沙妹”谈到：“现在我自己能挣钱，也会用电脑设计图纸，感觉有了用武之地。”其专业背景体现了新一代女性在家政领域的“职业化转向”。而“蝴蝶妹”等年长者则通过传授经验、组织社区活动，获得了新的尊重与社会角色。

此外，女性在组织平台上的集体身份重构亦值得关注。“五大姐”虽未纳入精准扶贫，却通过长期兼顾工作与家庭，被村委评为“好媳妇”。

“潜力女”通过制度支持、组织协作与社区网络三位一体的机制，使参与其中的女性实现了从“被扶持对象”到“能动劳动者”的身份跃迁，为乡村女性的再社会化与职业转型提供可行路径。

## 4 结论与启示

### 4.1 研究结论

本研究以“潜力女”企业为案例，运用参与式发展理论视角，分析农村女性在家政行业中的社区嵌入、协作机制与性别能动性。研究发现：

首先,社区嵌入为女性提供了稳定就业基础与社会支持资源。通过“近场就业”“家岗融合”“组织保障”等形式,女性不仅实现了从家庭到职场的空间转换,也通过社区型组织获得了制度性认同与安全感。

其次,协作机制强化了女性之间的集体互助与组织信任。“互助成长”“师徒带教”“资源共享”制度促进了员工的能力提升与职业认同,使个体不再孤立于市场关系之中,而是嵌入到一个互惠的组织网络之中。

第三,性别能动性在日常劳动中逐步生成。女性在工作过程中重构了自我价值、家庭地位与社会角色,不再是“临时替补劳动力”或“低端服务者”,而是具有专业能力、社会参与与文化表达能力的劳动主体。

## 4.2 理论与实践启示

(1) 参与式发展理论需重视性别视角与地方嵌入性。

本研究表明,真正的“参与”并非政策安排的工具性嵌套,而是通过具体组织结构与社区机制,激发女性的主动性与协作意愿<sup>[4]</sup>。因此,应在参与式发展实践中加强对性别结构与家庭语境的分析<sup>[13]</sup>。

(2) 地方组织在性别发展中的桥梁作用不容忽视。

以“潜力女家政”为代表的社区型女性就业平台,兼具社会服务、技能培训与情感支持功能,是实现农村女性发展与政策落地的关键支点<sup>[14]</sup>。乡村治理应进一步加强与此类中介组织的协同共建。

(3) 脱贫后的“发展问题”需转向能力持续与社会融入。

从“建档立卡”到“稳定就业”,不能仅依赖一次政策资源,更应关注妇女的后续成长性与社会参与空间<sup>[15]</sup>。研究表明,通过组织协作与社区赋权机制,女性得以持续构建职业身份并扩大社会能动空间。

## 4.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

本研究以“潜力女”平台为例,具有一定的地方性与案例依赖性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地域范围,比较不同社会结构背景下的女性家政就业实践。此外,建议加强对用工单位(雇主)视角、家庭支持系统与政策实施效果的多元调查,以丰富对“协作与嵌入”机制的理解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汪文正. 把家政服务嵌入社区[N/OL]. 人民日报海外版, 2023:11
- [2] 南静静, 东波. 新时代社会工作助力我国农村女性

脱贫能力提升路径探析[J/OL]. 怀化学院学报, 2019, 38(7): 32-36

[3] 段塔丽, 李玉磊, 王蓉, 等. 精准扶贫视角下贫困地区农村女性户主家庭能力脱贫实现路径探析——基于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[J/OL].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20, 49(6): 40-53

[4] 东波, 刘同玉. 赋权增能: 后脱贫时代农村女性多维贫困干预路径选择[EB/OL] (2020)

[5] 关红. 依托民间艺术产业发展促进湘西地区农村女性就业、脱贫路径探索[J/OL]. 湖南包装, 2019, 34(5): 11-13, 36

[6] 袁晓燕, 施夏敏, 石磊. 城市规模、服务业发展与流动女性就业[J/OL]. 学术月刊, 2023, 55(9): 58-67, 112

[7] 姜华, 顾立铭, 瞿正万, 林霞凤, 卢瑛, 蔡正宜, 孙喜蓉. 180名下岗后从事家政服务女性心身症状及相关因素[J/OL].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, 2004(3): 201-163

[8] 肖索未, 陈宗仕, 杨伊萌. 管理型中介: 家政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控制研究[J/OL]. 社会学研究, 2023, 38(4): 96-118, 228

[9] 李小云. 参与式发展概论理论方法工具[Z] (2001).

[10] 黄磊, 胡彬, 刘桂发. 参与式发展理论: 一个文献综述[J]. 大众科技, 2011, (11): 231-233.

[11] 王辉. 参与式发展理论视角下的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[D]. 北京化工大学, 2019.

[12] BraunV, ClarkeV. Thematic analysis: a practical guide[M]. London ; Thousand Oaks, California: SAGE, 2022.

[13] 李勇. 跨国家政女工: 父权制、资本主义和性别阶级的“共谋”[J/OL]. 深圳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, 2023, 40(2): 101-111

[14] 苏熠慧. 性别结构下的“边界协商”: 家政女工的“生产—再生产”安排研究[J]. 妇女研究论丛, 2024, (03): 39-50.

[15] 张慧瑜. 家政女工的四个“家”: 劳动、性别与文学书写[J]. 扬子江文学评论, 2024, (05): 45-51.

作者简介: 左丹(1983-), 女, 汉族, 河南商丘人, 博士, 副教授, 研究方向: 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。

基金资助: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(20BMZ137)阶段性成果。

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资助(项目编号: 2018SQN38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